

凭窗读史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。在神武门展厅一层，展出了一件特别的文物——旧木箱，上面划痕密布，叠压封条，一把老锁锈迹斑斑，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慷慨悲壮的岁月：

1933年山海关沦陷后，为防日寇劫毁，故宫博物院1.3万余箱文物精品，从北平迁往上海、南京，后在纷飞战火中，分三路南渡西迁十余省。抗战胜利后，又经历了东归、迁台和北返，历时二十多载，辗转数万里，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、行程最长、历时最久的“国宝长征”，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。

奇迹背后，是故宫守宝人在破碎山河中的不离不弃，是逃难同胞为国宝让路的深明大义，是国际友人在轰炸中的凛然守护……



1933年3月，太和门广场上等待起运的文物箱件。

“文化一亡，永无补救”

1933年2月5日，夜幕低垂，故宫博物院大门打开。一大批人力车夫拉着排子车，匆匆进入神武门。

太和门前广场上，摆满了贴着封条的大木箱。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身披斗篷，现场坐镇指挥，一件件木箱被有序运出太和门，经过午门，直奔北平西站。

沿途全线戒严，两旁军警持枪而立。火车站里，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，正静静等待这些木箱抵达。100名东北宪兵在车外守护，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。这些木箱里装的，是故宫精挑细选的文物，是举世无双的国宝。它们，要与日寇的炮火“赛跑”。

早在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后，易培基就开始酝酿故宫文物南迁一事。

易培基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。1924年，他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，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煜瀛一起，策动冯玉祥驱溥仪出宫。故宫收回国有后，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，易培基是其核心成员。1928年北伐成功后，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。

清室善后委员会曾于1924年召集上千人，用了5年多时间，第一次摸清了故宫的家底——117万余件文物。其中，像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、宋徽宗《听琴图》等，很多都是绝世珍品，是中华民族千年文脉的见证。

易培基深知，日本人侵占了中国东北，狼子野心绝不满足。平津一带难免发生战火，故宫文物在劫难逃，必须早做准备，必要时搬离北平。“国亡，尚有复国之日，文化一亡，则永无补救。”

故宫文物南迁，牵扯各方利益。易培基不敢声张，秘密安排员工挑选重要文物整理装箱，并反复叮嘱：不要声张，如果有人问起，说是为了整理库房。但故宫人员庞杂，消息还是不小心泄露了。

一时间，舆论四起。

许多北平市民不赞成南迁。东北沦陷，华北人心动荡，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，岂不是在向老百姓宣告，国民政府即将放弃北平、放弃华北？不要国土，不要人民，还成什么国家？北平街头打出横幅：“文物南迁就是逃！”“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！”

学界名流也纷纷站出来反对。胡适认为，在国际人士的监视下，未必有人敢破坏文化古物。况且，故宫文物数量巨大，迁移并非易事，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？徐志摩给国民政府呈文，请求故宫文物“无论巨细，概不出故宫之门”。鲁迅则写打油诗讽刺当局：“文化一去不复返，古城千载冷清清。”

最激烈的反对者，莫过于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。他联合各界成立了“北平市民保护古物协会”，自任主席，不断派人给支持南迁的工作人员打骚扰电话：“当心你的命！”并扬言一旦文物起运，就在火车站、铁路沿线放炸弹。

作为易培基在湖北学堂的同窗好友，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劝易培基，不要操之过急，“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，问题非常多，责任既重，闲话也多，内外的敌人，都等待着，我们最好不做此事！”易培基反驳道：“大敌当前，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，推卸责任！”

一片争议声中，1932年，中央政务会议讨论处理故宫文物办法，其决议之一竟然是：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，购飞机500架，以充国家抗敌之资。

易培基得到消息后，“不胜骇异”，连忙给坐镇北平、节制北方八省的张学良拍电报：“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，中外观瞻所系，乞公设法劝阻，始保全。”

当时，张学良背上了“不抵抗将

国宝南迁

——抗日烽火中故宫文物迁徙之路（上）



1935年，故宫文物南迁期间，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全体同人。前排右四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。

在太和门前高喊“誓与国宝共存亡”，并煽动拉运工人罢工。闹了一天，结果一件箱子也没能运出故宫。

易培基又气又急，赶紧给故宫博物院理事、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拍了一份求助电报。宋子文当时正在热河，电令北平市长周大文，拘拿周肇祥，关押10天。

文物南迁的日子改为2月5日。行政院密电张学良和北平市政府派军警沿途保护，随车押运。为稳民心，行政院还通过报纸向北平各界承诺：“北平安静，原物仍运还”。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。

2月5日夜，首批文物2118箱从故宫起运。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描述当时情景：“仓皇急遽，如救焚拯溺，呼吸之际，间不容发。”在那志良的记忆中，“当时非常寂静，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。没人说话，也没人唱歌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。”

那志良是首批文物押运人员之一。时年25岁的他，第一次离开北平。临行前，他的婶母抓了一包黄土送给他。老太太告诉他，这是家乡土，带上它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都不会忘记北平。

2月6日清晨，两列满载着故宫文物的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，在军队的护卫下一一向南。那一刻，没有人能料到，这些文物中的大多数，也如同随车押运的那志良一样，再也没能回到故地。



故宫文物改运洛阳与西安。他的理由是：“古物运往上海，存入租界，受外国人庇护，是国耻。”

故宫文物迁沪原是宋子文的主意，而这次中政会议，宋子文恰好不在南京。张继的理由冠冕堂皇，与会人员又无法反对，议案就这样通过了。

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来南京车站接车时，通知吴瀛：列车暂时停靠在站上，先不要卸车。行政院已经打电报到洛阳、西安，如果回电说有地方停靠，立刻转运过去。

吴瀛哭笑不得，但又毫无办法。他从军政部借了大批油布，盖在火车顶篷上，同时借调了500名官兵，加强防守。2118箱国宝就这样装在火车里，停在铁轨上，原地待命。那志良形容当时是“抬着棺材找坟地”。

等了将近一个月，宋子文回到南京，国民政府才最终决定：古物、图书照旧运沪，文献则暂留南京。

3月5日，1054箱古物、图书抵达上海滩金利源码头，存入上海法租界的仓库里。其余1064箱文献档案，则运存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大礼堂。

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又有四批文物先后运到上海。除了故宫自己的文物，还有古物陈列所、国子监和颐和园的一些文物，加起来一共有19621箱72包零8件。

就在文物迁到上海不久，故宫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有人控告易培基非法侵占、盗卖故宫文物，南京最高法院对易培基进行审查。易培基为自证清白，向理事会提出辞职。他在北平、上海、南京的房产被查封，财产也被没收，不得已逃到上海避难，于1937年在上海郁郁而终，年仅57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起“故宫盗宝案”被证实是一桩“凭空捏造”的冤案，但在当时却把故宫推向了风口浪尖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，选举继任者。故宫博物院理事于右任推举马衡为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，全体通过。

马衡是北京大学教授、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，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。他不仅是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的元老，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学家，有很高的社会声望，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，可以说是众望所归。然而，马衡却再三婉拒。

马衡之孙马思猛在《金石梦 故宫



故宫神武门展厅展出的文物南迁时期的旧木箱。



1930年代，国营招商局金利源码头，故宫南迁文物箱件从这里上岸。

1933年1月，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延禧宫库房前搬运文物。

张小英